1999 年第 4 期
第 36 卷
(总 194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 1999
General No. 194
Vol. 3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

叶静怡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关系的角度研究资本的本质和运动。韦伯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带有浓重的德国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色彩。韦伯的研究证明, 西欧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以及这种伦理的传播制度不仅对资本主义形成所需的种种特定历史条件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而且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社会科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关键词: 研究方法; 新教伦理; 天职; 制度;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1999)04-0064-06

社会科学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具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悠久的历史。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处于萌芽阶段时, 重商主义就奏响了这种研究的前奏曲, 随后, 重农学派, 亚当• 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 凯恩斯经济学 ……它们是资本主义从工业革命前夕、工业革命时期, 到后工业社会各个时期的对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又一个的宏伟乐章。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在众多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他不是直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不是直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 而是从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关系的角度研究资本的本质和运行的。

一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给我们再现了他关于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书中力求论证, 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 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韦伯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带有非常浓重的德国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色彩。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 从看得见的活生生物质到看不见的精神。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其经济特征和表现这

收稿日期: 1999-01-05
作者简介: 叶静怡(1955-), 女, 广东广州市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些特征的精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断地得到再生产、再确认、甚至扩大或强化，包括理性获利行为，即通过投入—产出的严格簿记和技术选择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自由雇佣劳动、生产商业化和市场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依赖以及法律制度对经济行为的规范和约束等等，它们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起点，同时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最高体现，它们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已无法把这种现实直接与宗教改革、新教伦理和道德联系在一起。马克斯·韦伯抓住了资本主义的这些最主要的经济特征，一层一层地探索经济特征背后的精神塑造痕迹，终于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渊源。这正是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进行研究的方法，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又是受黑格尔的《大逻辑》和《小逻辑》启迪的。

韦伯的方法是历史考察方法与逻辑考察方法的统一。资本积累和雇佣劳动(韦伯称之为自由劳动)既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更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历史前提。因此，资本积累、雇佣劳动等经济事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起点，从而资本积累、雇佣劳动等概念是在理性框架上认识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精神的内在联系的逻辑起点。在新教各宗各派的历史考察中韦伯从“天职”或“职业观”开始，进而考察新教在尘世活动中的禁欲主义、理性行事以履行天职最终结果是增添上帝的荣耀在不同宗派中的不同表现形式。禁欲主义、理性行事和“天职”概念是与资本积累和雇佣劳动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这种对宗教的逻辑考察方法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因而不是主观的或唯心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去甚远。

韦伯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在自己的探索中发现，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新教的“预定论”，它彻底摈弃以牧师作为桥梁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和拯救这一天主教义，提倡在尘世中以禁欲、以持之以恒的行善、以忠于职守来增添上帝的荣耀、感受自己在恩宠之中的伦理精神曾经是资产阶级抨击封建贵族地主阶级锐利的精神武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宗教基础和精神力量，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法律和法规的道德依据，是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最重要源泉。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财富巨大积累，“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1](P142)在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并且与之相适应的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与新教伦理已相去甚远，“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1](P143)历史的发展包含了双重的否定之否定，一是一种精神力量(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和道德)对另一种精神力量(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伦理和道德)的否定，它自身最终也被资本主义发展后所形成的新精神力量否定；二是一种精神力量(新教伦理和道德)对一种物质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诱导和支持而最终被后者否定，物质否定了精神，但新生的精神力量必定诱导和支持一种新的物质力量，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力量对旧的物质力量的否定。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是德国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早就向我们揭示过的历史发展规律。

二

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韦伯的研究证明,西欧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以及这种伦理的传播推广制度不仅对种种特定历史条件的形成和出现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自由劳动与“天职”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自由劳动(准确地说应该是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和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是建立在工人忠于职守、辛勤耐劳的基础上的。韦伯的考察表明,早期资本主义工厂中的熟练工人很大一部分是由信奉新教的个体手工业者转变而来的,“在手工业者中,天主教徒更趋于一直呆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多地成为行业的师傅;而新教徒却更多地被吸引到工厂里以填充熟练工和管理人员的位置。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有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1](P25)。显然新教伦理对近代工厂劳动大军的形成不无影响。

“天职”——上帝安排的任务,就这一基本含义而言,新教和天主教是共通的;但在宗教改革中,新教赋予“天职”以新的理解: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1](P59)职业的高低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但所有职业的价值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新教的这种天职观或职业观强调教徒从事职业应尽职尽责的意义,劳动即为天职,而不在乎从事的是何种职业,何种劳动。职业自由和不分贵贱的新教伦理事实上是传统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变为近代产业工人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和精神支持。

2. 剩余转变为资本与“天职”

传统农业社会中经济水平或者生产力水平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经济中的总产出超过维持人口最低生存费用水平下的总消费并达到一定的水平,即经济中出现一个达到一定量的稳定的剩余水平(剩余量/总产出)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剩余的存在使社会有可能把一部分社会财富用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发展,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然而,社会剩余在农业社会的早期就存在,许多古代文明就是建立在社会剩余的基础上的,可见,社会剩余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充要条件。社会剩余不被用作权力象征性的奢侈消费(大的如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小的如《红楼梦》中描写的官宦之家),社会剩余不仅仅用作储蓄,不论这种储蓄是出于以防万一的动机,或者是出于给后代留遗产的亲情愿望,要使社会剩余或储蓄转变为一种新的投资,就必须存在一种投资诱导,一种投资刺激,它使投资者预期自己的投资是有收益的,是可以获利的,人们节俭当前的消费是期望将来有更好的消费或更高的消费水平。投资预期收益的直接表现就是投资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其销售价格高于成本价格,即所谓通过价格差额赚钱,只有当通过价格差额赚取利润的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并且得到制度或法律的保障时,节俭行为才会得到鼓励,资本才会积累,剩余才能转变为投资,并进而使资本投

资成为一种生产方式。

新教伦理为投资者,即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为理性经济人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持。宗教改革以前的欧洲,在人们的宗教信仰中天主教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天主教看来,高价出售商品以挣钱,是不符合其教义的,被认为是欺诈和剥削。新教的"天职"观和"预定论"(卡尔文所创立)否定了天主教教义的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得救与否是由上帝"预定"的;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前者是注定得救的,后者则注定为上帝所摈弃,"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和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卡尔文要人相信,某些人的发财致富不是由于剥削和欺诈,而是由于他们是上帝预定的选民,他们遵从上帝的旨意行事,是不可指责的。不仅如此,新教的"天职"观还认为,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他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但另一条并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一个教徒的经营获利程度越高,就越能得到上帝的首肯。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如果上帝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么上帝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诚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1](P127)在新教伦理中,资本主义经济微观运行单位、个人和企业的经营目标为利润最大化这一事实本身被赋予了神的旨意,是清教徒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成功、发财致富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就能得救,就能进天堂。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投资的获利性提供了制度保证的话,那么,新教则为其提供了道德伦理保证。

3. 科学技术创新与"天职"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要素,科学技术革命和创新所推动的生产力的进步和国民福利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大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战胜了封建传统农业经济制度。科学技术进步不仅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在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如果把经济增长看作是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函数,劳动、资本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相对作用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工业化的早期,劳动的贡献份额开始下降,资本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都是不断增加的,但前者的贡献份额远远大于后者的贡献份额;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劳动贡献份额继续下降然后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资本和技术进步份额继续上升,但二者的差额不断缩小,到一定的阶段资本的贡献份额开始呈下降趋势,而技术进步贡献的份额继续上升,最终技术进步的作用超过了资本的作用;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在各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一直保持最大的份额。

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换句话说,把各种科学研究成果转变为生产技术、转变为产品技术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把大量的人力、资金和时间投入技术研究和开发的目的是什么?技术开发的动力何在?显然,理性经济人行为决定企业经营的目的是盈利,只有当企业感到不进行技术创新就无法生存的时候,企业才会有压力去从事技术开发投资;压力来自竞争,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竞争越激烈,企业就越感到有压力,企业就要去推进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满足市场需求,以保持自己的市场地位,否则将被淘汰。然而,技术开发是一种长期投资,是要冒风险的,风险可能来自开发后的技术不为市场所接受而导致投

资失败,也可能来自开发后的技术很有市场效益却被他人窃取或模仿,导致技术开发成本由一个企业独自承担,收益却被其他企业共同分享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客观上使企业失去了技术开发的动力。如果说前一种风险的防范主要依赖于企业自身决策的话,那么后一种风险的防范则要依赖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专利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企业预期能够从技术开发中获得利益从而使企业具有技术开发的内在冲动的制度保障。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对技术进步的鼓励来自哪里? 保护资本利益、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从何而来?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既是该国家、该民族的历史沉淀,又是该国家、该民族一定发展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信仰、习俗的结晶,是一种民族共识的产物,约定俗成构成了法律的基础。西方国家宗教改革后逐渐在民众中传播、扎根的“预定论”和“天职”、“责任”的伦理观念,是人们对勤劳致富、非暴力理性获利行为认可和认同的基础,从而是保护技术进步、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础。

4. 合格劳动力培养与新教传播制度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劳动生产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大规模的有组织劳动。要系统地、理性地组织投入和产出以求获得最大的利润,首先要对劳动进行组织和管理,即是人对人的组织和管理。企业中劳动力的构成从领导和被领导或组织管理和被组织管理的角度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经理等管理人员,另一类是被管理的一般工人。一个运转良好的企业对不同的劳动力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素质要求。如果我们不讨论企业与市场关系问题,只是考虑企业内部的组织劳动问题,那么企业合格劳动力的共同素质要求是具有刻苦耐劳,尽职尽责以及团队精神;不同的要求则表现为经理人员应具有管理、组织、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的才能,一般工人应有严守纪律、服从命令、积极工作的良好素质。

学校教育是培养资本主义企业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学校不仅传授知识和技巧、技术,而且创造了一种环境和氛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与同学交往,与老师交往,形成学生毕业后投入社会各界与更多人交往的前期准备。然而,单纯依赖学校教育是不能培养出资本主义企业大量需要的人才。企业大量需要的是既要有技术才能,又要服从组织、服从命令,尽职尽责的劳动力,培育这样的劳动力需要一个教育系统,是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作用的结果。新教伦理以及它的传播方式构成了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如前面所分析的,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包含了劳动即为天职,而不在乎从事的是何种职业,何种劳动,只要尽职尽责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宠的这一基本思想正是资本主义企业劳动力所需要的精神。新教的这些新思想是如何得到传播的呢? 宗教改革否定了传统天主教义,重新解释《圣经》中的许多概念和范畴,批判了腐败的与广大教徒日益脱离的高高在上的天主教会。但是,宗教改革并没有否定宗教传播的方式。无论是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还是新教理论大师、改革的重要设计者和实践者约翰·卡尔文,他们都只是认为教会组织应该进行改革,而不是被废除;教民应该受到教会纪律的约束。事实上,新教的思想、伦理和道德观念就是通过教会组织进行传播的。教会的集会,定期的礼拜,传教士的劝说,圣徒通过阅读《圣经》与上帝进行直接的交流,圣徒之间对《圣经》不同理解的交流,以及对照《圣经》进行自身的反省,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序的精神和道德教育系统,这个系统传播着新教伦理,传播着劳动即天职的观念,同时还训练着人们的服从和敬业精神,在培养资本主义企业所需劳动力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韦伯是从新教伦理、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对物质生产方式产生作用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尽管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自己认为，这种研究只是认识和揭示历史真理的一个方面，他不能够代替也不能够否定其他人的不同研究，然而韦伯独特的研究出发点和方法，以及建立在大量史实材料基础上的雄辩论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而且为我们认识历史真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和借鉴。

[参　考　文　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责任编辑　　何　方）

Research on the Approach and Thought of Max Weber's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YE Jing-yi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China)

Abstract: Max Weber contributes indispensably to the research on capitalism with his famous book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is article is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roach used by Max Weber i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emphasis is on the philosophy of bounden duty based o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its relations with a) free labor, b) surplus being converted to capital investment and c) the creation of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he essential role played by the dissemination of Protestantism in educating workers is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research approach; protestant bounden; duty; institute; capitalist